

“闲着不挣钱,怎么养老?”“家里没地了,要挣钱还得打工,”“养老保险,够我养老吗?”

四名高龄农民工的活法

本报记者 黄康文/图

冬日的北京,北风让早晨外出的人能感受到刺骨的寒意。然而,就在这样的凌晨却有这样一群年岁已高,却依然辛苦劳作的打工者在默默地工作着,为城市修管道,运送新鲜蔬菜,打扫卫生……11月5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近这样一群人,看这样一群高龄农民工的活法……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与总量连年冲高,且从业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其中尤以建筑业为重。今年最新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高龄农民工的绝对数量更进一步冲高至4684.545万人,接近4700万人,从年龄段看,50岁农民工,从2010年的12.9%上升至2014年17.1%。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而在社会保障方面,高龄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建筑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参保率分别仅有5.4%和3.9%。

“闲着不挣钱,怎么养老?”

11月5日凌晨1:46,在北京东城区安德路与旧鼓楼大街的交会口,戴着一顶绿色迷彩帽穿着一件红色荧光薄夹克的史忠亮,往自己手里吐了口吐沫,然后抡起锄头用力地刨起来。

来自河北沧州的他,下个月就要过自己64岁的生日了。已经干了5个多小时活的他决定歇口气。和他一道的老友们正在从路边的大卡车里扛10CM口径的钢管,停放一旁的切割机不时响起,火星四溅,把满脸的沟壑映得分外清晰。声音嘈杂,史忠亮几乎是靠比划跟《工人日报》记者交谈。就这样,史忠亮一边干活一边和记者交谈,直到早晨6点才勉强歇了会儿。

年年都会出来打短工的他,自己一

般是春出冬回,每年都会在外地待上八九个月。“活多时,一月能挣上两三千元钱,快抵上家里五亩枣林半年的收入了。”他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像这样跟着老乡帮电信公司铺设地下管道,一晚上能挣120元钱,虽说工钱年底才结,可晚上比白天挣的多。”

史忠亮觉得干起活儿来自己并不老:“搬砖、抹灰、搞卫生、挖沟铺砖我都行。抡盖子,师傅挣180元,我挣100元。”指着人行道上的井盖,他补充道。膝下的儿女也在外打工,上次见到同在北京当厨师的儿子,还是今年春节。

谈起为什么出来赚钱,史忠亮说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趁着自己身体好,多干几年好攒点钱能给自己养老。“闲着不挣钱,怎么养老?”说起住的地方,史忠亮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出来挣钱,不能要求太高。他和老乡现在帐篷里住着,两个帐篷,住20多个人,吃馒头管够,这就行啦!说起这些,史忠亮显得很知足。

“家里没有地,就得靠打工”

11月5日凌晨2:46,桑国秀此时正和儿子从北京香山附近的出租屋去往两个小时车程之外的新发地果蔬市场的路上。4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8岁的孙子正在酣睡,远在千里之外的安徽阜阳县上老家两个读初中的孙女不知睡得可好。

9:00,记者在北京西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的新民菜市场见到她时,她正拿着啃了半口的烧饼一边吃着边和顾客就一撮白菜是两块六毛四还是两块五在讨价还价。今年57岁的她,白了半边头发,上秤、算钱、拾掇摊位看起来仍然十分麻利。

1993年,她和老伴带着15岁就辍学在家的儿子来北京谋生。在海淀区人民大学西门附近的部队干休所大院市场卖菜,一干就是15年,直到2008年市场拆了才来到这边。“搬过来之后,生意就难做了。”她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她这个摊位每月要缴5000多元的摊位费,200元的卫生费,塑料袋还得从市场买那种两毛一个的。“难做也得做,人要吃

饭,没钱就出来挣钱。就是这个理。”一旁的老伴插了一句。

异于少言言语的老伴,桑国秀说话时总是乐呵呵的,可谈到两个在老家寄宿学校的孙女,她有点语噎。原来,早先孙女也跟着她们在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分校读书,因为要回去考高中,所以初二就回老家了。“特别想她们。”“想有什么法子,就是留守儿童。”在一旁搬菜的儿子补了一句。“孙子今年8岁,在和平里小学读二年级,以后也得这么办。”

桑国秀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自己在老家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母亲,但家里因为征地没有地了,要挣钱就得靠打工,一家人已经三年没回安徽老家了。桑国秀说,看到电视上,好些国家好政策我们也可以享受,可我们不在家,也不能知道,在这里也顾不上打听。老人憨憨地笑着说,“也就想想,趁着自己还硬朗多干点活,给自己多攒些养老钱。”老人紧接着补了一句。

“养老保险,够我养老吗?”

11月5日凌晨3:46,山东菏泽鄄城的孙师傅传到了出门的时间。从2012年1月29号第一天上班起,在什刹海保洁队一队已经工作了三年11个月的他除了一年五天的假期每天准点起床,风雨无阻,和三位工友负责地安门外大街的环卫工作。一天近1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他们每人要清理四五车的居民生活垃圾,行人乱扔的果皮纸屑垃圾,然后用脚踏车送到另一条街的垃圾站。

50岁之前没离开过家的他,一直在家里的砖窑厂干活,后来县里要建工业园,把砖窑厂拆了,自己也就没活干了。“家里挣钱少,这把年纪了也得出来找活干,孩子他娘在假发厂捋头发,一个月拿1000元钱。家里四个小孩,有两个还在读书,正是花钱的时候。”他告诉记者。

和20多位工友住在新开胡同两个上下铺的平房里,孙师傅感到很满足。在他看来,不花钱,咋住都行。省一点,就是攒一

点。除了能免费住,让孙师傅满足的还有活了大半辈子,自己居然能有保险。他告诉记者,现在,自己每月交209元钱养老保险,单位补贴一部分,比在家一无所有强多了,自己出点也甘心。2006年,当地政府以一亩地补贴1200元的价格征用了自己家里的十亩后,孙师傅一直盘算着自己干不动之后,怎么办?养老保险,让他看到了盼头。

在养老保险这个问题上,二大队的蒲仕忠显然比孙师傅想得深。老家在四川广元剑阁县元山镇的他今年55岁,下颚一茬

茬的白胡须,让他看起来比同龄人老上许多。和儿子相依为命的蒲仕忠在北京待了9年,原来在西直门干环卫工,2011年来到什刹海保洁队二队,和另外一位工友负责鼓楼到东不压桥的1000多米的主干道保洁。说起养老保险,蒲仕忠又激动又疑惑。他告诉记者,自己以前没交过养老保险,现在交了四年多了,可还有五年就退休,没有达到国家政策规定要求的15年缴纳标准,也从未听说有组织集中补缴的说法。蒲仕忠有点担心:“养老保险,够我养老吗?”

采访手记

高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他们用自己年迈的身躯撑起一个家庭的半边天际,他们不等不靠,用自己的双手讨生活。他们既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更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和劳动为社会奉献的基石。

采访的过程中,略显生涩的他们,或悲观或乐观,但身上的那份质朴,始终令人感动。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龄却背井离乡打拼。这些高龄农民工也盼望着“上面的好政策”。但囿于自身信息获取渠道上的闭塞,即使有好的政策出台,他们也不能及时获取并共享。再加上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这种代际传承,恐怕还要延续下去。



蒲仕忠冒着寒风在清扫街面。

“我们是很普通的工地夫妻,能安全工作,挣钱回家过年,就是我们的愿望”

塔吊上的“家”

丈夫是高空中的塔吊司机,阿牛是地面上的塔吊指挥。苏体项目严格执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资格管制,塔吊工持证上岗是基本要求。项目当前有13台塔吊处于工作之中,丈夫操作的二号塔吊便是其中的一座。塔吊成

为他们在工作中的“家”,阿牛手中的对讲机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全部组系。

采访过程中,阿牛嘟囔着丈夫今天迟到了,待会要批评他。恰巧这个时候杨勇推门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束玫瑰和一盒心形巧克力。

平凡的生活中丈夫总会给妻子带来一些惊喜。阿牛说丈夫很疼惜自己,一般家务琐事都是丈夫打理,至少早上睡醒了早餐总是已经放在桌上了,阿牛讲这些的时候,杨勇没有插一句话,只是笑着专注地看着这个像小女孩一样的爱人。这也不是他第一次送礼物,去年妻子生日的时候他送了一条项链,花了大半个月的工资。

吃饭时,因为自己是塔吊指挥的事情,阿牛一直有些得意,俨然成为丈夫工作中的领导。“我们就是很普通的工地夫妻,能安全工作,挣钱回家过年,就是我们的愿望。”

重庆石壕煤矿：农民工点赞“职工小家”

本报讯(记者李国 通讯员徐兵)11月4日,重庆能源集团石壕煤矿标准化“职工小家”在各基层连队正式落成,为基层500余名农民工打造出了集学习培训、参与管理、娱乐活动、生活互助为一体的服务平台。“现在,在队上足不出户就可以上网、看书学习了,有不懂的找职工小家,有困难职工小家就会来帮忙。”该矿农民工看到新落成的“职工小家”,纷纷为其点赞。

据了解,“职工小家”包括工会小家和青年园地两部分,工会小家涵盖职工安全、文艺、创新活动,职工“五必访五必谈”,职工“五个人第一”,工会组织建设,安康杯竞赛等;青年园地涵盖青年思想帮扶、青年文明素养提升、人才培养、团组织建设等。

浙江省江山:

返乡农民工有了信贷支持

本报讯“来来来,吃蜜橘,我这橘子皮薄汁多,味道纯,口感好。”浙江省江山市四都镇垭头村返乡农民工橘农徐朝法一边采摘,一边向来往的客商介绍道。在漫山遍野的橘园里,看到金黄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刚采摘下来尚未装筐的蜜橘就被等候在一旁的客商哄抢一空,很是热闹。

据悉,近年来,江山农商银行充分结合农村土地流转实现橘子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需求,大力扶持以蜜橘、柑橘、冰糖橙为主要品种的专业合作社,累计发放专项信贷支农资金4000万元,橘子产业已成为广大返乡农民工增收致富的主要渠道。(郑春燕 王利)

本报记者 高柱 李娜

“希望工程完成后,你们一定尽快把农民工欠薪从工程款中剥离清算出来,这都是170名农民工的血汗钱,拜托了!”11月3日下午近5点,57岁的四川绵阳市总工会信访接待室主任、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徐强站在办公桌旁,一手用力捶打自己的腰腿,一手持电话苦口婆心催促一农民工讨薪案件进展。

一组陈旧的两座沙发,三张摆满案卷的办公桌……记者看到的便是绵阳市总工会的接访工作室,而这间20余平方米的3人工作间虽然陈设简单,却写满了斐然成绩:自2013年至今,受理、调解维权案件总计923件,农民工维权办结率高达100%,共为1620名农民工追回欠薪和赔偿2450万元。

400余万农业人口中,转移就业人员超过150余万,每年关于农民工讨薪等维权案件的案卷高摞,仅有三人的组织力量如何支撑?近日,记者来到绵阳市总工会,深入采访该市工会100%解决农民工维权诉求的背后故事。

时刻做好“四千”准备

“有诉必接,有接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付”,这是绵阳市总对于农民工维权工作的‘定调’,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原则付诸实践的。”徐强把三查案卷交到《工人日报》记者手中说,“你看,这是我刚刚打电话在催的案子,很难办,但马上要过年了,关乎170名农民工的利益,市总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拿下!”

通过翻看案卷,记者了解到这是一起涉及绵阳、泸州、自贡三地170名农民工在山西

省兴县工程建设中总计800余万元的讨薪案。所有当事农民工自2013年起在兴县薛家山隧道工程务工,既没有与工程分包公司签订合同,也没有约定工价,至今有超过60%农民工薪资无法兑现。“跨省案,人数多、数额大、案情复杂、持续时间长,这个案子看起来是有些棘手。”《工人日报》记者指着案卷探寻的看向徐强,不料他使劲儿吸引了一口烟“嘿嘿”回复说,“恩,确实棘手!”

然而徐强所说的“棘手”却另有原因。由于当事农民工班组长在带队的时候,与工程分包单位做了“包工包料”的口头约定,而到目前为止工程还未结算,材料款和农民工工资混搅在一起,无法确定最终欠薪金额,绵阳市总就无法进一步开展和推进讨薪工作,只能从外围对当事农民工进行维权指导,自8月份接案至今,已经召集农民工代表开了三次会,却始终进展不大,“现在是有劲儿使不上,干着急。”

“这工作我干了6年,遇到的案子都难办,好解决的问题职工群众也不会来找我们工会。”徐强说,绵阳工会所有维权案件的办结都历经了“四千”之艰,是“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后才换来对职工群众诉求的功德圆满。

锦囊妙计“四三二”

——绵阳市总工会农民工维权办结率100%的背后故事

“接了案子,就必须做好这‘四千’准备。”徐强随手抽出一叠案卷给记者看,“这个案子也是山西的,当时费尽周折协商出解决方案,但欠薪方就给了两字:没钱。”徐强说,当时唯一想法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案子卡在“尾巴”上,于是迅速和当地工会取得联系,启动城际间联动维权预案,经当地住建、劳动等部门多方努力,欠薪方同意以房产拍卖形式支付农民工工资,“这在山西可是唯一一例,当时各地讨薪人数很多,我们的农民工是最先拿到工资的。”徐强神情自豪地说,“只要方法对,就是铁蛋也能磕出缝,咱为老百姓办事就得有这个韧劲儿。”

心有底气“三不怕”

“不怕事多,不怕事难,不怕事很烦,工会干部吃的就是这碗饭。”绵阳市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彭时荣进入工会虽仅有两年时间,但对工会工作却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然而凡事口说容易,实践难。记者了解到,今年至今绵阳市总已受理10人以上农民工跨省维权讨薪案18件,省内案件和日常性事务同样繁多,而该市工会法律部工作人员只有3人,该如何承担?

根据数据统计,绵阳市有农业人口417.7

万人,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238.19万,其中转移就业人口151.26万,占农村劳动力总人口的64.5%。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转移就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一些技术含量低,文化知识要求不高的建筑、制造、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关方面因用人不规范等原因产生的劳资纠纷十分普遍。“绵阳市的维权案子多,办起来难度也大,所以我们的经验是必须要以健全的组织架构和科学的统筹安排,来作为开展工作的支撑。”彭时荣说。

记者了解到,绵阳市总为积极回应职工群众维权诉求,现已建立日趋完善的职工维权联动平台。首先联合市人社等部门,形成劳动关系矛盾、职工信访问题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建立法律援助处置机制,有工会指派律师团成员向职工提供法律援助,仅2015年春节前夕,就通过专项行动接待和服务农民工2415人次,追回欠薪和工伤赔偿超过千万元。

“市总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了维权服务的‘重拳’,这是我们敢夸口‘三不怕’的底气所在。”徐强说,正是在多方协同作战下,他们才有更多精力专注攻破重点讨薪案件。

超龄环卫工上班被车撞难报工伤

应鼓励超龄工人按城镇职工来缴纳养老、医疗等五险,有困难的应优先缴工伤险

本报记者 杨召奎

日前,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63岁的环卫工人毕彩连在工作中被一辆面包车撞伤,但临海市环卫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毕彩连属于超龄工人,无法为她申报工伤。

据媒体报道,10月20日早上7点40分左右,毕彩连在临海市崇和门广场附近清扫垃圾时,被一辆面包车撞伤。主治医生表示:“她的头部受伤严重,虽然无生命危险,但后续的治疗比较麻烦,费用比较大。”

而临海交警大队的董警官表示,肇事者开车时穿的是高跟鞋,对该事故负全部责任。但毕彩连的女儿应女士说,从事故发生到11月2日,其母亲已花费7万元医疗费,但肇事方仅拿出3.3万元钱。“现在在家里拿不出钱来,下周母亲又要做手术,如果没有资金,治疗可就耽误了。”

应女士认为,其母亲在工作期间受伤,应算工伤。但环卫部门有关负责人则表示,按规定,符合工伤保险缴纳条件的工人,男性需60周岁以下,女性在50周岁以下,“毕彩连是两年多前来我们这里工作的,因为年龄原因,只能签劳务合同,无法购买工伤保险。因此,受伤后也无法申报工伤。”

对此,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丹表示,201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中明确,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然而,在现实中,社保行政部门多以工伤认定应以劳动关系为前提,要求劳动者先确定劳动关系再进行工伤认定。

但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因此,超龄劳动者要想认定劳动关系非常困难。

“由于无法进行劳动关系认定,超龄农民工要顺利进行工伤认定确实很难。如果无法认定工伤,只能到法院起诉单位要求人身损害赔偿。但由于维权成本太高、程序太繁琐,一些工人不得不接受用人单位提出的私了协议。”北京市君本律师事务所王飞律师对记者说。

对此,王飞律师表示,随着中国的老龄化、劳动力短缺,超龄劳动者势必越来越多,这些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值得关注。由于超龄劳动者没有工伤保险,他们在工作当中受伤,大部分赔偿费用只能由用人单位承担,单位最好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

那么,如何从政策层面来解决超龄环卫工人的权益保障呢?近年来,有关超龄环卫工人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受到了全国政协的关注。今年9月,“环卫工人权益保障”调研组在内蒙古考察期间发现,环卫工人年龄普遍偏大。由于这些50至65岁的工人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在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调整范畴内,因此用人单位既不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也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区环卫系统没有劳动关系的劳务用工达到2.96万人,占到总量的50.5%。

“既然高龄农民工有就业愿望,城市也需要他们。但同时,我们要想办法尽量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保障。”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胡晓义建议,应鼓励超龄工人按城镇职工来缴纳养老、医疗等五险,有困难的应优先选择缴纳工伤保险。

工作有温度,维权有力度

“工作要有温度,维权要有力度。”这是彭时荣在谈到工会维权工作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然而如何才能体现温度 and 力度?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逐渐找到了答案。

“当职工群众求助时,工会第一时间就能知晓,这就是有温度的工作。”绵阳市总法律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市总在职工维权信息平台上,配备专人接听职工维权热线、收集网络舆情动态、接待职工来访、汇集处理信息,把每一项工作都落实到具体工作人员身上,形成“资源共享、部门联动、广泛参与、人人受益”的维权工作格局。“而所谓力度,就是再难的案子最终都要给出让农民工满意的答复,即使有些工作超出了工会工作范畴。”

今年初,徐强遇到了接手维权工作最为复杂的农民工讨薪案件。132名川籍农民工在宁夏银川遭遇欠薪,原本在绵阳工会介入后已经顺利解决,不料在支付欠薪款项时,所涉劳务公司为套出工程款,伪造多份委托支付函,工程方立即推翻此前所有协商内容,面对突发事件,最终徐强等绵阳工会代表立即对所有支付函进行了工程量鉴定,历经几番波折去伪存真,成功帮助农民工讨回80余万元工资。“打假”肯定不是咱工会的工作,但为了职工群众的利益,啥问题都得一管到底!”于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中寻找突破,以不怕事多,不怕事难,不怕事很烦的真诚为农民工服务……绵阳工会实现农民工维权案件100%办结的数字背后写满了不易,“为农民工维权没有捷径可言,但只要从为职工群众贴心、实打实的服务出发,就没有完成不了的工作。”彭时荣说。